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六 編 第 2 冊

回顧與反思 ——古代文論研究七十年

張海明 著



古典文論研究輯刊

六 編

曾 永 義 主編

第 2 冊

回顧與反思
——古代文論研究七十年

張 海 明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回顧與反思——古代文論研究七十年／張海明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 101〕

序 6+ 目 2+212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六編：第 2 冊）

ISBN：978-986-254-946-9（精裝）

1. 中國文學 2. 文學理論

820.8

101014835

ISBN-978-986-254-946-9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六 編 第 二 冊

ISBN：978-986-254-946-9

回顧與反思

——古代文論研究七十年

作 者 張海明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2 年 9 月

定 價 六編 18 冊（精裝）新台幣 3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回顧與反思
——古代文論研究七十年

張海明 著

作者簡介

張海明，男，1957年出生，雲南昆明人。1982年7月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獲學士學位，1985年7月獲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文藝學專業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講授文學概論、中國古代文論等課程。1991年在職從啟功先生讀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1994年7月獲博士學位。1997年評為教授，1999年增列為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生導師。1997年年由文藝學教研室調到古典文學教研室，曾擔任北師大文學院古代文學研究所所長，兼任文藝學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2007年調入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現為該系文藝學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要從事：1、有關中國古代文論範疇和學科史的研究；2、有關魏晉玄學與文學相互關係的研究；3、有關中西比較詩學研究史、比較詩學的學科定位的研究。自1999年擔任博士生指導教師以來，分別在中國古典文學文獻學、中國古典文學唐宋文學方向、文藝學中國古代文論方向招收、指導碩士和博士研究生。

主要著述：1、《經與緯的交結——中國古代文藝學範疇論要》，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再版；2、《玄妙之境》，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3、《回顧與反思——古代文論研究七十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4、《中國文學思想史》（主要撰稿人之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文學遺產》等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

提 要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對學科史的研究成為一種帶有普遍性的趨勢，值此新舊世紀交替之際，人們不約而同地駐足回顧自本世紀初至今學科發展的歷程，反思這近一個世紀各自領域研究的發展變遷及經驗教訓，以期從中總結出若干具有規律性的東西，更好地指導今後的研究。就古代文論研究領域而言，雖然從八十年代中期已有零星的學科史研究文章散見於報刊，但系統而全面的專著尚未出現，《回顧與反思：古代文論研究七十年》正是在這樣一種學術氛圍下，對創立於本世紀二十年代的新興學科——中國文學批評史，作了較為全面的學科史的研究。應該說，該課題的研究，對於系統瞭解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七十年來的發展概況，客觀估價七十年來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與存在的不足，進一步促進學科建設，有著積極的意義。該課題的完成，對於廣大古代文論研究者和古典文學研究者，乃至文藝理論研究者，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對於高校中文專業的本科生、研究生，也不失為一本帶有指南性質的古代文論研究的入門導讀。

全書約22萬字，除篇首《導言》外，共分為九章：1、古代文論研究的歷史與現狀；2、古代文論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3、對中國古代文論特性的認識；4、古代文論與現代文論；5、走向比較詩學；6、資料整理；7、史的編撰；8、專題和範疇研究；9、海外和港台地區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正如以上各章題目所示，本書首先追溯了古代文論研究的歷史，描述了古代文論研究的現狀，並對成就與不足作了客觀的評判。在此基礎上，較為深入地分析了古代文論研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性質，包括其特殊的研究對象與目的，研究方法，以及對研究主體的若干要求等。從建設具有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出發，本書分別討論了近十年來學界對中國古代文論體系和特徵的認識、古代文論與現代文論之間的關係，進而就建設具有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可行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書認為，比較詩學是當前乃至今後一個時期內古代文論研究的發展趨勢，具有十分廣闊的發展前景，它將縱向研究與橫

向研究融為一體，對於實現古代文論向現代文論的轉換，尋求跨越東西古今共同的文學規律，有著頗為重要的意義。大概而言，前5章偏於綜論，集中探討學科理論層面的問題；後4章則按研究範圍的不同，分別評述了七十年來古代文論研究在資料整理、史的編撰、專題和範疇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問題。毋庸置疑，在這幾個方面，我們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存在的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譬如我們的資料整理還沒有一部較為詳盡的彙編，還沒有運用現代化的研究手段；批評史的編撰還停留在傳統的按類編排的階段，未能真正體現史的意識，尤其是文學批評史自身的發展規律；在專題範疇研究和專人專著研究方面，如何既尊重歷史又立足當代，更好地處理歷史還原與現代闡釋的關係仍有待於進一步的探討；此外，本書還對海外和台港地區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作了初步的介紹，儘管佔有的資料遠非全部，但管斑窺豹，亦可為我們今後的研究提供若干借鑒。

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史論結合是本書的一大特色。作者並不止於對學科史的描述評判，而且注意從史的追溯中發現存在的問題，尤其是那些關係到學科建設與發展的問題，加以分析，盡可能理清頭緒，給出答案。在描述學科發展軌跡的同時，作者常常將自己對問題的理解融入其間，雖然只是一家之見，卻使本書具有了一定的理論深度，能夠予人啟迪，引人思索。顯然，較之一般性的介紹，這更有助於深化對問題的認識。

對學科史的梳理研究是一項相當耗費時力的工程。七十年來，古代文論研究的專著多達百十種，文章數千篇，以個人的時間精力，幾乎不可能一一過目，全部瀏覽一遍，因此，本書雖然盡量勾畫出學科發展的輪廓，但遺漏也在所難免。以古代文論研究的重要性而論，本該有一部更為詳盡、系統的學科研究史，有從不同角度入手的分類梳理，評論總結，以期對歷史、對存在問題有更全面完備的認識，而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問津者不多。另外，儘管本書就若干存在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卻並不意味著問題已經得到徹底的解決，限於個人的學力眼界，對問題的認識或許不無謬誤。對一些長期困擾研究界的問題，譬如古代文論和現代文論的關係，吸收、借鑒傳統文論以發展建設具有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以及如何使古代文論研究更上一層樓等等，都需要我們進一步去探討，而且這種探討應該既在理論層面，也在實踐層面。就是說，學科史研究的最終目的，仍須落實為具體的理論研究，其意義和價值也只能通過學科的進展、開拓體現出來。

學術研究需要反思

蔡鍾翔

「學科史」（或專題學術研究史）已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因為學術研究需要掌握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需要瞭解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已達到的研究水平，需要總結前人的經驗教訓，這樣才能避免重複勞動，虛耗無用之功，才能避免重複失誤，再走過去曾經走過的彎路，才能正確地選擇主攻目標，在研究的廣度或深度上向前推進或有所突破，那麼，學科史可以給研究者提供切實的幫助。就古代文論研究領域來看，具有學科史性質的論文已屢見發表，如牟世金為《文心雕龍研究論文集》撰寫的《龍學七十年概觀》，羅宗強、盧盛江寫於 1989 年的《四十年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反思》，都是很有分量的，此外一些專業雜誌也刊登過階段性的研究綜述，一些大型工具書如《文心雕龍學綜覽》也開闢了研究概述的專欄。但是，儘管研究者呼喚這門學科史的出臺，卻至今還沒有一部專著問世。原因是顯而易見的，這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古代文論研究的圈子不算大，但據我粗略的估計，八十年代中期以來論文年產量（包括古代美學）約在六、七百篇到近千篇，專著年產若干種，單是掃描一遍，就得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更為艱難的是評騭優劣，分辨是非，發現問題的癥結，指明前進的道路，這不僅要下踏實的功夫，而且須有高明的識見。學科史是研究的研究，回顧以往，瞻望未來，肩負為學術導航的使命，毋怪眾多學者會望而卻步了。現在看到了張海明博士的新著《回顧與反思——古代文論研究七十年》，我深深地欽佩他執著的毅力和開創的膽力。雖然全書不過二十餘萬字，還不能說已臻完美，但畢竟是第一部古代文論研究史的專著，從 1927 年到 1996 年，時間跨越之長也是前所未有的。作者的投入是很大的，七十年中古代文論研究的主要論著都須涉獵，其廣搜

博采的辛勤是可以想見的。當然還不免有掛漏之處，部分章節有以論代史的缺陷，還不能全面展示研究的狀況，但如果著眼於對研究的反思，就會讚賞作者思考的深刻性。除了介紹性地列舉評論各類研究成果外，作者把力量集中在幾個理論熱點上，如中國古代文論的民族特性、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中西文論的比較研究等，都設立了專門的章節。對於這些一度成為焦點的論題，作者確實經過了深思熟慮，因而能在分歧的意見中抓住要領，或者在某一較合理的觀點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生發出相當精闢的見解。

在《對中國古代文論特性的認識》一章中，他提出了「民族特色」概念的界定問題：

我們需要澄清：所謂古代文論的民族特色，究竟是只為中國古代文論所獨有的若干特徵，還是既體現了某種古今中外共通文心，同時又具備獨特的表述形式的部分？也就是說，只是其特殊性，還是某種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對於後者，我們則需要區分不同的層面：是理論體系本身的特徵，還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特殊表現？是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總體特徵，還是只屬於某些特定領域的具體特徵？

在中國古代文論民族特點的討論中，可謂眾說紛紜，言人人殊，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概念的把握不確定，因此概念的釐清的確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作者把中國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比擬為兩個相交的圓，接著又提出相交的部分究竟有多大的問題：

如果這部分足夠大，那就意味著中西文學理論之間並不存在明顯的差異；相反，如果相交部分遠遠小於不相交的部分，則說明中西文學理論有著本質的不同。……如果我們贊成前一種觀點，那麼古代文論的民族特色便只是局部的、外在的；而如果我們持後一種觀點，則古代文論的民族特色就應是整體的、內在的。

不管得出的結論是什麼，沿著這樣的思路追索下去，就把探討引向更深的層面。作者也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如把原道觀（把文學看作是道本體的外化）作為古代文論體系的核心，這個論點還可以商榷，但不可否認這是一種探本之論，較之以重抒情、重表現為民族特色之類的說法更接近了古代文論的本質。關於民族特色的討論熱潮已經過去，但遠沒有達成共識，形成定論，作者的反思對於以後的繼續深入是有啟發性的。

「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近來又成爲文藝理論的熱門話題。在古代文論研究剛剛起步的時候已涉及這個問題，歷經七十年仍然沒有解決，因此歷史的經驗更值得注意。古代文論研究的發軔正是緣於五四以後中西文化的撞擊，無論是陳鍾凡首創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編撰，還是以楊鴻烈、朱光潛爲代表的中國詩學的構建，都借鑒了西方的現代文學概念、理論框架以及研究方法，同時也肯定了古代文論的現代價值。古代文論研究並沒有侷限於封閉自足的經院式研究。解放以後，古代文論的冷落是由於被視爲封建性糟粕而遭摒棄，但時間不長，五十年代末周揚倡議建設有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古代文論的研究重新興起。後來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斷。文革以後，古代文論研究復振的勢頭很猛，古代文論的當代意義一再列爲中心議題。然後因西方文論的大潮湧入而降溫，直到最近又提上議事日程。由於痛感缺乏民族特色的中國文論在世界上沒有自己的地位，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已是迫在眉睫的當務之急。歷史的追溯顯示，古代文論研究的幾番起落都和對古代文論的現代意義的估價密切相關，認識的大幅度擺動延誤了研究的進程。但在認識了古代文論的價值之後，問題是否能迎刃而解，實踐卻告訴我們，事情並不那麼簡單。一是古代文論的現代闡釋問題，大家幾乎一致認爲，既不能以古釋古，也不應改鑄古人，使古人現代化，但由於古今之間失去了延續性，現代概念大都來自西方，因此只要是現代闡釋就不可避免地會變形、走樣，難以做到真正的「還原」。這種二律背反的兩難處境一直困擾著古代文論的研究者們。再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文藝學融匯吸收古代文論的問題。現在通行的方式是仍然保留源於西方的現代文論框架，而充填古代文論的材料於其中，但這樣古代文論終究處於從屬的附庸的地位，無以體現中國特色。也有一些學者贊成以古代文論的體系爲框架的方案，這樣做難度很大，因爲古代文化中存在的「潛體系」還有待於發掘探索，而且這種「古色古香」的文藝理論能否與現代文藝相適應也很成問題。看來「西體中用」或「中體西用」都不理想，那麼還有沒有第三種選擇？本書作者在周密地分析了「延續性和斷裂性」、「兼容性和互補性」、「顯在性和潛在性」這三種關係之後，提出了一個立足點的問題：「究竟立足於何處，才是建構新理論的理想而又切實的根基？」這的確是解開扣子的樞機所在。他認爲：「無論何種選擇，在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藝理論這一工程中，中國古代文論確實必須佔有一個舉足輕重的位置」。「從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藝理論的角度來看，研究古代文

論的意義或價值，首先是為理論建設提供一個堅實的根基，同時這個根基又不是傳統文論體系的簡單照搬，而是經現代意識審視、改造了的產物。在此意義上說，傳統是發展了的傳統，當代是與傳統相承續的當代，如此，我們就不會在立足點問題上左右為難，進退失據，遊移於傳統與當代之間」。我們且不論作者是否已為古代文論研究指明了「走出誤區」的路線，但作者的結論在大方向上是不錯的。必須以傳統為根基，但傳統與當代之間這條斷裂了的線索應連接起來，這裏突出了傳統的改造，經過改造，「傳統是發展了的傳統，當代是與傳統相承續的當代」，就庶幾可以擺脫進退失據的困境了。因此，作者提出，「古代文論要想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論中發揮效用，前提是激活它，使之與現代接軌」。這個提法很好，先要讓古代文論在當前的文藝活動中活起來。在具體的操作上不妨從局部的範疇、命題入手，但不能僅此止步，還應該「考察其理論體系和表現形態方面的意義，由此深入到思維方式和文化心理的層次，……才能真正推進當代文藝理論的建設」，否則仍不免陷入鑲嵌拼貼的模式。就古代文論的現代闡釋來講，也不能僅僅理解為用相對應的現代話語來翻譯，這樣勢必只能傳達其共通性，而不得不抹殺其特殊性，因此應該深入到「人類之心理歷程和審美現象」的深層次來溝通古今。眼下恰逢「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在學術會議和學術刊物上展開討論，張海明這一家之言，是一份較為全面、辯證的答卷，他從紛繁複雜的成堆問題中理清了頭緒，找準了核心，一定能推動這場討論的深化。

七十年來，古代文論從史的研究到比較研究，到範疇研究，到體系研究，一步步向橫廣、向縱深發展，其中史的研究開始最早，成果也最多，而且規模越來越大，如今已出版了五卷本的《中國文學理論史》、七卷本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八卷本的《中國文學思想通史》正在陸續推出。本書作者在肯定了這些成績之後，發表了一段很值得重視的議論：

學科研究的拓展，更多的是表現為批評史卷帙的增加，以材料收羅的完備和闡釋的細緻取勝，而不是表現為執簡馭繁，由博返約，以對歷史發展內在軌跡的深刻認識見長。……一部優秀的簡史，不應只是繁重之批評史的簡寫本，它首先必須具備史的意識，能夠準確把握批評史發展流變的脈絡，於提要鉤玄中見出批評史自身的總體特性和內在規律。……

我作為五卷本《中國文學理論史》的作者之一，對這一主張深表贊同，今後

史的編寫不必再加大加細，更迫切需要執簡馭繁，由博返約，寫出一部優秀的簡史。我們不揣淺薄，正醞釀著一卷本《中國文學理論史》的寫作，我們也意識到簡史比多卷本實際上更難寫。

張海明博士誠懇地邀我作序，我本來是不具備資格的，因為我沒有對七十年來的古代文論研究作過認真的回顧和反思，如今勉強寫出，不過是一些粗淺的感想。但讀了這部著作，我的收穫是很大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更深地領悟了學術研究需要反思。

1997年3月15日



目

次

學術研究需要反思（序） 蔡鍾翔	
引 言	1
第一章 古代文論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1
一、早期的古代文論研究	11
二、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的研究	17
三、新時期以來的古代文論研究	22
第二章 古代文論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31
一、古代文論研究的學科性質	35
二、對象與目的	37
三、研究方法	42
四、研究主體	46
第三章 對中國古代文論特性的認識	51
一、研究的意義與方法	52
二、古代文論體系的特徵	55
三、文學本論特徵	60
四、文學分論特徵	65
第四章 古代文論和現代文論	71
一、從“民族化”到“中國特色”	72
二、走出誤區	78
三、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	85

第五章 走向比較詩學	93
一、八十年代以來的比較詩學熱及其原因	93
二、中西比較詩學的歷史與發展	98
三、比較詩學和古代文論研究	108
第六章 資料整理	117
一、資料的收集	117
二、資料的考訂	122
三、資料的編選	126
四、資料的釋譯	131
五、資料的利用	135
第七章 史的編撰	141
一、七十年來批評史撰寫的實績	141
二、若干值得注意的問題	148
三、增強學科自省意識，促進批評史研究的深化	155
第八章 專題與範疇研究	165
一、研究的進展	166
二、問題的反思	174
三、方法的選擇	181
第九章 海外和台港地區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	187
一、日本和韓國學者的研究	188
二、西方學者的研究	195
三、台港學者的研究	202
重印後記	211

引言

或許與臨近世紀末不無關係，進入八十年代中期以來，學科史的研究正開始成為文學研究的一個新的熱點。在經過紛至遝來的觀念變革，方法嘗試之後，研究者們不約而同地感到有必要對以往的研究作全面系統的總結，以期更好地認識其特徵，把握其規律，進而實現學科研究的科學化，並在此基礎上將研究推向深入。所以，儘管學科不同，層面不同，但這種總結性的學科史研究的確開始形成一種趨勢，一些各具特色的學科史研究著作也陸續面世。

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一般說來，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學術研究，尤其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大體上都經歷了三重轉折：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的近代西學的影響，這對傳統觀念、思維和治學方式是一個巨大的衝擊，其結果是若干新人文學科的誕生，或舊有學科的重新建構；二是五十年代以後意識形態的更替，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指導思想，這一轉變同樣導致了學術研究在觀念與方法上的革命，使之呈現出不同於先前的新的面貌；三是發軔於七十年代後期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改革開放的社會背景，使這一時期的學術研究普遍趨於多元化發展的格局，而且從一開始就帶有濃厚的反思與探索色彩。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歷史轉折時期的每一個，都是以對先前研究的批判甚至否定為起點的。雖然隨著人們認識的發展，早先簡單化的弊病得到一定程度的糾正，但總體而言，中國現代學術研究的發展進程基本上是按照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的思路來演進的，因此，這種發展進程必然表現為一種「之」字形的搖擺，一種不斷地推倒重建的循環。而經過這樣三重轉折，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人們才

得以在一個更高的視點上來反觀本世紀以來的整個學術歷程，對之進行全面的反思、總結。應該說，這既表現出學人的心態趨於成熟，同時也反映出歷史發展的某種必然。

中國古代文論或批評史的研究同樣如此。如果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回顧性文章主要著眼點還只是對文革十年的批判的話，那麼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人們回顧、反思的視野已轉向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十年，並進而向學科草創時期延伸，一些經過認真思考，較有份量的論文開始見諸報刊。至八十年代末更引發了大家的興趣，以至於成為專題討論的重要內容。這本小書的構想與寫作，就是在這樣一個學術背景之下對於七十年來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史的一種思考，一種述評。

既然是一種述評，那麼，對於八十年代中期以來有關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史的種種認識、評判，當然也就有必要在本書中佔有一個特殊的位置，事實上，它正是本書《引言》討論的主要內容。我以為，由此入手，一方面可以作為認識和瞭解七十年古代文論研究史的一個捷徑，且可藉以展示本書之概要；另一方面，本書參考這些回顧性或綜述性文章之處甚多，書中雖已注明，但散見各處，故仍應在此介紹其基本觀點，以便讀者對之有較全面的瞭解。此外，儘管將要介紹的這些文章本身已是對學科史的回顧與反思，我們仍可以將其作為回顧與反思的對象，恰如本書日後也不免被人品頭論足一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學科史研究正是如此。後來者雖未必一定居上，卻有責任檢視、述評此前人們所做的工作，至於所述是否客觀，所評是否公允，那是後來者水平、能力的問題，可以盡力而難以盡善了。

就我所見，最早對建國以來古代文論研究進行全面回顧的文章，當是董丁誠的《古代文論研究的崛興》。^{〔註1〕}該文有一個副標題：「為慶祝建國三十五周年而作」，可見其總結三十五年來古代文論研究情況的意圖。不過，文章雖然略述了三十五年來古代文論研究所取得的成績，但主要內容還是對八十年代初期古代文論研究情況的評述。董文肯定了古代文論研究的目標在於建設民族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認為新方法特別是比較方法的引入對於開闊視野，重新認識古代文論的價值具有重要的意義，而進入八十年代以後古代文論研究隊伍的壯大、學術爭鳴的風氣更表明形勢喜人。恰如作者自己所

〔註1〕董文發表於《西北大學學報》1984年第3期，後收入華東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選編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方法論集》。

說，寫作此文的用意，「不過是表示對古代文論以至整個學術研究蓬勃發展的大好局面的喜悅之情」。至於這大好局面之後所隱藏的問題，作者尚未明確意識。

張兵於 1985 年初發表的《建國後古代文論研究述評》一文，〔註 2〕開始比較系統地梳理總結自五十年代以來的古代文論研究。文章對五、六十年代古代文論研究史作了回顧，充分肯定了這一時期在資料整理和理論研究方面的成就，以之為「我國古代文論研究史上的第一個發展高潮」。與董丁誠文相似，張文的重點也在新時期以來的古代文論研究，所不同者，張文從資料工作、史論研究和隊伍三個方面對新時期以來古代文論研究的進展擇要作了述評，並在總結經驗的同時，提出了一些當前研究中應注意的問題。其中有些如古代文論研究應聯繫文學史上的創作實際，加強資料的收集、整理、出版等，在此後發表的同類論文中得到應和。

同年刊出的牟世金《古代文論研究現狀之我見》，是一篇經過認真思考，頗有見地的總結性論文。〔註 3〕作者的意圖，在於認清古代文論研究的現狀和探討今後發展的方向。所以，文章在肯定古代文論研究已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時，指出古代文論研究「近年來不僅已迅速進入它的茁壯成長時期，且面臨著一個急劇的變革和深化時期」。牟世金認為，古代文論研究在八十年代的長足發展主要得益於思想解放和新方法的運用，而目前存在的問題亦在思想的繼續解放和不同方法的相互補充。牟文還特別提到了對古代文論民族特色的研究應著眼於本質性、規律性、全局性，要端正學風，提倡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將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理論闡發和資料整理結合起來，在「從容按節」的基礎上實現「長轡遠馭」。與前兩篇文章相比，牟文更多冷靜的思考，更側重探求現象之後的根源，對存在問題也有著更敏銳的感受。

也就是從牟世金這篇文章開始，對古代文論研究之歷史與現狀的思考、對存在問題及解決途徑的探尋逐漸成為人們共同關注的課題。此後陸續發表的同類文章，重心都移在了這一方面。如吳調公的《老樹新花的啓示——新時期十年古代文論研究隨想》明確指出，新時期古代文論研究發展的第一步，「是對過去研究的自我反思」，而只有處在隨體制改革而來的歷史轉折時期，「站在十字路口的人們才有可能進行理論上的反省」，正是因為有這種反省，

〔註 2〕張兵文載《齊魯學刊》1985 年第 1 期。

〔註 3〕牟世金文載《文學遺產》1985 年第 4 期。

這種前所未有的自覺，新時期十年的古代文論研究才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創新高潮。具體些說，即是有意識地將宏觀的研究與微觀的研究結合起來，將歷史的研究與美學的研究結合起來，從而既有對古代文論的整體辨識，又有對特定理論家及其著作個性的深入探討。吳文認為，「以人爲中心，由此多維地探求古代文論家的心靈，探求作用於他們的群體意識」，是爲新時期十年古代文論研究所給予的啓示。^{〔註4〕}張少康的《古代文論研究的現狀與發展》一文在肯定十年來取得成績的同時，著重對古代文論研究中存在的學風不正現象作了批評。文章概括了學風不正的四種表現，即：輕率概括、實用主義、輾轉引用、望文生義，以之爲影響研究深入的主要障礙；進而指出，古代文論研究要想有新的突破，除了具備嚴謹的學風之外，還必須做到三個結合：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結合，理論批評研究和創作實際研究的結合，古與今、中與西的科學結合。^{〔註5〕}應該說，無論是對新時期十年古代文論研究取得的成績的肯定，還是對存在問題的批評，這兩篇文章的見解都是公允的、客觀的，所進行的思考、提出的意見也是具有建設性的。作爲長期研治古代文論的專家，他們對這一領域的發展變化自然有著真切的感受。

不過，若論見解之深刻，褒貶之得當，述評之全面，則無疑是羅宗強、盧盛江二人於1989年撰寫的長達兩萬餘字的《四十年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反思》一文。^{〔註6〕}這篇文章所以給人高屋建瓴、深穩厚重之感，並非因爲它的篇幅，或討論的範圍超出了新時期十年，而在於作者通過對四十年古代文論研究史的回顧，更爲深入地把握到存在問題的實質，並以一种歷史的辯證的眼光來看待存在的問題，從而後來居上。文章首先指出，迄今爲止，關於古代文論研究的目的問題並未真正解決，我們一向主張的爲建設具有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服務，其實並不就是研究目的的全部，除此之外，古代文論的研究還可以有助於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質，幫助我們瞭解、研究歷史，爲文化承傳服務。「有時候，對於歷史的真切描述本身就是研究目的」。作者並不反對古爲今用的提法，然而，「把視野人爲地限制在一個小範圍內，對於研究領域的拓展、方法的選擇、價值的衡定，都會有不好的影響」。其次，作者認為，四十年來古代文論研究的主要精力是用在理論分析上，成績不小，

〔註4〕 吳調公文載《文藝理論研究》1987年第1期。

〔註5〕 見《求索》1988年第2期。

〔註6〕 見《文學遺產》1989年第4期。